数字经济的机遇与挑战

□沈联涛 肖耿

中国数字经济的崛起势如破竹：中国占全球电子商务的比重已经高达42%；全世界最成功的科技初创企业有三分之一在中国；中国每年的移动支付总额更是美国的11倍。

中国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要归功于其丰富多样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监管者和政府对技术发展的友好态度，以及巨大的消费市场。中国有7.31亿互联网用户，比欧盟和美国的总和还要多。

这些因素为中国金融技术（FinTech）市场的高增长预期奠定了基础。高盛公司预测，2016-2020年间，与消费有关的第三方支付量将从1.9万亿美元增长到4.6万亿美元；非传统贷款人贷款将从1560亿美元增加到7640亿美元；新的在线导向的资产管理规模将从8.3万亿美元增加到11.9万亿美元。

中国也正在加快人工智能（AI）方面的投资。根据麦肯锡公司的报告《人工智能：对中国的影响》测算，取决于采用AI的速度，AI技术将为中国GDP增长带来0.8-1.4个百分点的增量。谷歌AI中国近期在北京成立，由在中国出生的谷歌云计算首席科学家李飞飞主持。

但中国数字经济仍有很长的路要走。麦肯锡公司的最新研究《数字中国：赋予经济全球竞争力》指出，美国数字化程度仍比中国高4.9倍，不同行业的数字化水平参差不齐。在追赶及缩短差距的过程中，中国将面临严峻挑战。麦肯锡报告指出，到2030年数字化有望改变四个关键行业（消费和零售、汽车和交通、医疗、物流），并创造相当于全行业10%-45%的收入。这将对现有的价值链体系造成巨大冲击，增加就业、消费和社会环境的不确定性。

为了确保数字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应对突破性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产业与社会风险，中国数字经济需要实施明智的监管机制，这就需要审慎考察推动及制约技术进步的各种因素。

十年前，几乎没人预测到中国会发生如此引人注目的数字经济突破。事实上，两位互联网先锋——阿里巴巴的马云和腾讯的马化腾，创业之初都经历过失败。受益于中国对外开放及鼓励试验与创新的政策，这两家公司才能获得外国资本和技术，并在海外进行首次公开募股（IPO）——腾讯在香港上市，阿里巴巴在纽约上市。

他们利用新数字技术以及高质量的电讯及物流公共基础设施，来撬动和构建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数字服务业，从而成为中国数字经济崛起的先锋。阿里巴巴的电子商务平台降低了交易成本，开拓了新市场，挤出了制约生产率提升的传统中介；腾讯的微信降低了个体之间通讯、交流、协作和社会活动的成本，刺激了跨行业创新。两家公司的创新成功推翻了制造、分销、媒体和金融之间的壁垒，帮助中国经济在规模、范围上与速度维度同步提升。

中国迅速崛起的新经济带来了巨大的生产率、收入和财富提升，是民营企业活力与市场创造力的写照。各级政府也为市场创新提供了便利，明智地选择了在市场发展的初期对新生事物采取网开一面的灵活政策，监管措施不但允许民企及市场不断扩张，还让这些市场成功融入全球经济。

然而，基于市场的创新具有内在不可预测性，与创新有关的预期常常会过度高估或低估现实可能。对于中国的数字经济，监管滞后加剧了营商环境的失衡，可能导致金融和债务风险、污染和收入不平均等社会问题。

在现行体制下，需要政府来解决这些问题。在过去五年中，政府也确实在尝试解决这些问题，但通常会使用传统、非系统性，以及现成的行政管理工具。在过去一年，有关部门逐步收紧了对加密数字货币（比特币）、互联网融资平台、影子银行、跨境资本流动、地方债务及证券市场的监管。

这些应急措施在短期有其必要，却无法根除导致风险与不确定性的一些更基本的制度因素，即如何处理创新过程中的失败、损失、监管漏洞等“灰犀牛”问题。因此，中国需要构建更有效的制度与机制来应对企业破产、吸收损失，以及管理风险和不确定性。特别是，需要健全的破产流程、有活力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有效的社会安全体系、可靠的公共住房体系，以及旨在降低收入与财富不平等的累进税制。与此同时，为了遏制一些市场不平衡，需要引入更强的竞争法、反腐败机制以及环境监管。

数字经济天然有利于市场，有利于提高生产率，有利于全球化。但如果没有有效的监管，数字经济可能导致严重的经济失衡，甚至影响到社会稳定。在新经济对传统经济具有大规模冲击力的时代，在突破性技术进步、人口老龄化和气候变化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环境下，这一点尤其重要。

为了实现数字经济的潜力，并避免其可能的弊端，需要构建公正包容的社会制度来保护产权及确保有效的市场。换句话说，一切都取决于清楚、合理、有效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角色。（沈联涛是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杰出研究员，UNEP可持续金融顾问委员会成员。肖耿是香港大学教授及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会长。本文版权属于Project Syndicate）

及早应对风险苗头 加快房地产长效机制建设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 邹士年

当前不断升级的调控政策对于遏制房地产投机性需求和房价过快上涨趋势起到决定性作用，尤其是租购并举制度对于房地产市场预期的稳定和长效机制的建设都很关键，更有助于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健康持续发展。但是，调控过程显然也会带来一部分不利影响，尤其是要关注调控带来的一系列风险苗头，以便早做应对，避免房地产市场大起大落。

避免房地产市场大起大落

一是房地产企业资金链风险。随着调控的持续和深入，房地产市场的风险也逐渐显露，其中较为突出的就是房企资金链问题。房地产企业由于投资额大，回收期长，大都需要一定的财务杠杆，一般负债率都较高。而通常企业资产负债率低于75%被认为是安全的。而我国房地产行业负债率自2008年后快速攀升，从2009年的65.02%快速攀升到2016年的76.7%。2017年上半年的中国前10大房地产公司的平均资产负债率高达79.6%，其中最高的高达91.9%。与此同时，随着土地成本的上升和调控带来的融资成本上升，房地产行业的盈利能力不断下降，销售毛利率和销售净利率分别从2009年的36.54%和16.65%，下降到2016年的27.24%和10.48%，分别下降9.3个和6.2个百分点。最值得担忧的是房地产企业前期依靠大量举债快速扩张，2018年和2019年将是债务的集中兑付期（2018年为3375亿元，2019年为4474亿元），当前的调控加深，会使得房地产销售受到影响，回款周期将会变长，回款周期和债务周期会产生错配，加剧偿债风险。随着房地产调控趋严和金融监管加强，房企在国内融资的难度不断上升，部分房企不得不转向海外融资。

二是保障房土地供给大幅挤占商品住宅土地供应。大力发展公租房及共有产权等多种形式的住房供给，大力完善我国多层次住房体系，这种供给侧的改革确实很好地解决一部分年轻人刚性需求问题，以促进“居者有其屋”目标的实现。但是，也要谨防地方以此为理由，大幅减少商品住宅的供给。以北京为例，2017年住宅用地610公顷（2016年住宅用地1200公顷），这其中保障性住宅350公顷，与2016年基本持平，而商品住宅计划供地仅260公顷（还包括83公顷的单列自住型商品房项目），比2016年减少了近7成。近期上海、广州和杭州等各大城市更是不断推出只租不售地块。而深圳11月份推出的龙华地块项目建成后，租赁住房和商业用房在出让年期内须全年期70年自持，限整体登记，不得销售、转让。商品房供地的大幅减少必然加强市场对商品房上涨的预期，加剧未来调控政策的退出难度。

三是部分地区商品住宅的供应开始明显下滑。受严厉调控影响，市场供需出现双向缩量的特征，价格的限制和成交的低迷使得市场观望气氛浓，企业只要现金流没有问题，并不急于加快开发进度和出货。虽然2012年6月国土部发布的《闲置土地处置办法》规定，闲置土地未动工开发满一年的，按出让价20%缴纳土地闲置费。未动工开发满两年的，无偿收回。但是这一规定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有些开发商按时开工，但会通过各种手段拖延工期，或者在竣工后迟迟不拿预售证。2017年三季度以来全国商品房住宅供应大幅下滑，一线城市商品住宅供应面积同比锐减33%，除深圳上涨外，其余城市回落明显。2017年三季度，北京供应面积仅40万平方米，同比大幅下降70%；广州同比下降36%。虽然26个二线城市商品住宅供应总量同比上涨18%，但城市供应量同比跌多涨少，仅个别城市涨幅明显。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调控带来调控地区楼市成交量的下滑，而新房价格又受到限价的约束，开发商推盘的积极性不高。加上2016年销售业绩良好，开发商有一定的基础，并不急于在低迷的情况下加快开发进度，更多在等待调整后的机会，因为这些调控严厉的地区往往都是并不担心库存的地区。

四是库存周期上升的城市增加。受不断升级的调控影响多数一二线城市市场成交持续低迷，库存开始积压。受成交持续低迷影响，有50%的城市消化周期同比上升。一、二线城市消化周期明显上升，北京、深圳、福州、厦门超18个月警戒线，沈阳、大连也高于15个月。热点城市由于严厉的调控使得供需双方都受到限制，而需求下降的速度快于供给的速度，从而使得去化周期有所延长。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受到严厉调控的地区供需都出现一定的紧缩，市场活跃度下降，而在供需都受到约束的情况下，需求下滑的幅度更大，从而导致去库存周期开始上升。

五方面加快长效机制建设

当前房地产调控因城施策的政策显然还需继续贯彻下去，但是也需要关注不同区域房地产市场调控加深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降低调控对市场正常供需的扭曲，注意防范调控对房企带来的资金链风险，加强研判和应对，在调控的同时应加快房地产长效机制的建设，为将来行政性调控退出做准备，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平稳发展。

第一，加快形成多元化融资格局的房地产金融体系。房地产市场的健康持续发展需要建立一整套长效机制，包括加快形成房地产金融市场的多元化融资体系。这套融资体系需要为房地产发展提供了前进的基础和台阶，拓展多元化的房地产融资渠道，不仅是债券，还有地产信托，REITs、股权融资、基金、特定资产收益、资产管理计划等多种手段。与此同时，还需建立完善的社会征信制度，规范房地产企业和金融机构的管理和经营，建立房地产金融风险预警和监测体系。房地产企业应根据自身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目标。加强企业信誉建设，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加快资金回笼。提高财务管理能力，优化资金结构。建立财务风险预警机制，避免债务和资金的错配。

第二，根据人口流入规模决定商品住宅土地供给。当前土地供应虽然已经考虑人口流入状况，但是在建立租购并举的过程中还是需要把握好“租”和“购”的比例，商品房土地的供给应该充分考虑到常住人口的流入情况。而公租房的建设除了考虑常住人口流入外，更多考虑流动人口的情况。多层次住房供给体系的完善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尤其是要考虑到我国住房文化的特点，大部分人对租赁的需求只是一种过渡，因此，避免一哄而上的重视租赁房建设，大幅忽视对商品房的供给。同时，在引导住房市场消费方面，务必要处理好购房和租房的关系，引导一种“先租房，后买房；先买小房，后逐步改善”的住房梯度消费理念。各地政府在加大公租房供给的同时，还要考虑将来公租房的退出。各地公租房建设要按需而供，建造设计要考虑到国情和文化特点，一旦将来公租房过剩时可以作为商品房退出。

在土地供给上，对照发达国家工业用地与建设用地比例，我国应大力增加城市建设用地的比重，相应减少农村建设用地比重，实施土地随人口流动的供给政策。在土地招拍中，政府掌握土地一级市场的供给，减少开发商竞标抬价和持地待涨行为。同时，加强对各地地价动态监测，及时掌握地价异常变动。加强对国有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约束，防止其频频成为地王，产生恶劣社会影响。同时，各个城市应该大力加强存量土地的集约化利用，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

第三，多措并举加快商品住宅开发供应进度。针对当前热点地区受到调控导致开发商观望情绪和放缓开发进度的现象，国土部应进一步在开、竣工环节加强督导，以加速库存形成实际供应。如果这一动作仍无法保证竣工后的项目尽快入市，也可以考虑出台强化入市的相关措施，以加强商品住宅供应的正常化。除了督促房地产企业加快商品房开发和销售进度外，在房价较高城市的商品住宅供给上，可以加快共有产权住房的供给，北京共有产权住房已从探索走向落实，未来京沪两地试点共有产权住房的经验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推广。使得商品住宅不但在供给速度上加快，在供给类型上也有更多的突破，多层次增加商品住宅的供应，降低市场对商品住宅供给不足带来的房价上升预期。

第四，适度放松对热点地区非投机性需求的限制。当前的房地产调控都是以行政为主的中短期行为，调控显然都具有一定的时效性，调控过程中也应适当纠偏。当前调控对于投机性需求的遏制显然取得一定效果，但是让正常的刚需和改善性需求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首套的刚需成本出现上升，改善性需求得到一定遏制，也就导致成交量的大幅下滑。进而会带来观望情绪的加重，显然不利于房地产市场的活跃，导致库存的重新加重。因此，在当前调控取得一定效果的条件下，可以适当放松部分热点地区的改善性需求，这对活跃市场，调动供需主体的积极性，缩短库存周期都有较大作用。但是，注意加强政策监管和执行，防止出现市场预期的改变。

第五，加快长效机制的建立及政策的完善。从长远来看，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才是促进市场稳定的治本之策。要从根本上还原房地产本来属性，即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除了加大保障性住房外，还需要提高持有多套住房成本，让住房回归居住属性。同时，还应抓紧解决小产权房和70年产权到期的续期问题，给市场形成合理预期。存在于城市周边的大量小产权房，尤其是高房价城市周边，这种既成事实的规模化的小产权房显然难以都一拆了事，必须拿出彻底的解决方法。而70年产权到期和一些商住50年到期后应该如何续权也应该有明确的制度安排。

中国新能源发展何以快速跃至世界第一

□厦门大学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 林伯强

中国新能源发展举世瞩目，引领能源改革与能源转型大潮，与航母、高铁等成为新时代中国闪亮的名片。

短短十年内，中国完成了从新能源起步到世界第一的过程。2011年中国风电装机46GW，光伏装机仅2GW；与当时世界可再生能源的领头羊德国相比，同年的德国已经有风电装机29GW，光伏装机24GW。而至笔者撰稿之日，中国风电装机已达约180GW，光伏装机约120GW，而德国风电光伏装机约为50GW与40GW。2016年全年，中国并网风光发电已占总发电量的5.1%。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新能源发展面临几个突出特点与困难：第一，中国能源需求总量巨大。因此中国新能源发展与能源转型是人类历史上难以借鉴的伟大工程，需要发挥开拓与自力更生撸起袖子加油干的精神。第二，中国新能源发展需要解决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与日益严峻的环境压力，以及支持经济发展需要等错综复杂的矛盾。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其经济发展相对稳定，环境早已得到改善，新能源与传统能源是简单的替代关系。而中国经济仍以庞大体量和惯性发展，新能源既要替代传统能源，为缓解环境压力做出贡献；又要与传统能源一起满足不断扩张的能源需求。第三，中国新能源资源禀赋与总体能源需求存在区域倒置现象，这导致在发达国家可以顺利运用的（如分布式光伏）新能源发展路线在中国难以复制。以上种种既是困难，也是发展机遇，因此新能源发展路线非常重要，包括：目光长远，效率优先，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充分学习国外先进经验，结合本国实际制定政策，确保发展方向正确。

中国新能源的快速发展体现了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在大发展中制定大目标，激活大市场，保持高效率。中国新能源发展始终坚持以政府为主导，集中力量优化资源配置，充分调动了产业积极性，高效地解决一些新能源发展的集中性问题。

中国新能源发展中遇到过三个重大难题：第一是发展初期的成本问题。中国的解决方式是坚持产业规划发展，在政府政策支持下规模化发展基础制造业，以产业扩张实现大幅度成本降低。第二是2012年左右的新能源国外市场萎缩与限制的问题。中国及时启动了庞大的国内市场装机计划，避免了新能源制造业的崩溃，有力护航了国内产业链的发展整合，为今天中国新能源产业的世界主导地位奠定了基础。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期国外新能源巨头的接连陨落。第三个问题是解决近两年来凸显的弃风弃光。弃风弃光是全世界新能源发展的共同难题，2015年开始中国弃风弃光现象引起重视后，政府通过高效的调控手段，合理统筹了新能源发电行业、传统发电行业、电网以及用电侧企业调配、消纳电力资源，至2017年这一现象得到了比较有效的缓解。以上三大难题的高效解决（缓解）充分体现了新能源发展的制度优越性。

中国新能源发展充分发挥了中国赖以立国的制造业优势，这条发展路径体现了对中国自己工业能力的自信。中国的新能源发展特别是国内市场发展晚于发达国家，起步时技术并不先进、补贴也相比不算高、发展模式不明晰。而中国新能源产业并不囿于这一短期困难，以规模化生产成本优势为切入点，从整体培育与适度竞争的角度解决这一根本难题。以光伏为例，中国制造使得光伏组件成本十年间下降了90%，突破了40余年来发达国家的学习成本曲线。从规模优势、成本优势起手，尔后积累人才优势、技术优势，最终实现市场优势。

中国的新能源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一条可以参照学习的发展道路。只要社会支持、政策得当，如中国一样环境压力大的发展中国家一样可以发展好新能源，甚至可以利用后发优势比发达国家发展得更快。发达国家特别是一些欧洲国家前几年的新能源发展一定程度上片面地传递了一个信息：新能源是富人的游戏，社会需要负担起高昂补贴来换取新能源的发展空间。以德国为例，发展新能源以来，其平均居民电价翻倍，电价构成中仅可再生附加这一项就超过了中国的平均电力价格。这样的发展路径是发展中国家所承受不起和难以选择的。由于新能源的环境外部性问题，仅仅依靠市场经济，解决其发展问题可能滞于短期困难而缺乏总体规划。中国路线的成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等同样面临资源约束与环境困扰的大国树立了榜样。

准确把握经济新形势下的新动能

□中央财经大学客座导师 张文强

中美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节奏不同，给中国国内货币政策、产业政策、财政政策、外汇政策、外贸政策等提出了难题。面对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需要理清当前经济发展的理念和政策脉络，同时准确把握新经济形势下的新动能。

判断经济形势的基本出发点

十年前，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导致国际金融危机，此后美国经济陷入了严重衰退的经济周期，之后美联储通过一系列量化宽松政策刺激美国经济逐步回升，三大股指连创新高，目前房地产价格已经超越了危机前的水平，整个经济在增长和就业方面实际上已经接近繁荣。而其货币政策也从2015年12月开始以每次25基点缓慢加息了5次，再加上即将推出的缩表措施，可以说货币政策正在逐渐回归正常。其金融周期从2008年见顶、2013年触底，目前正在上升途中。其金融风险，内部通过企业和家庭部门去杠杆，外部利用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已经有效释放和摊薄。

我国经济在危机发生后迅速采取了4万亿财政外加9.6万亿信贷的强刺激。这种刺激在带领全球经济率先反弹的同时，也给自身制造了大量落后产能和宏观经济的高杠杆。宏观经济进入了中速增长的新常态，相应的金融周期逐渐接近顶部。

国际清算银行（BIS）的研究显示，以GDP增长和通胀为代表的经济周期一般持续1-8年，而一个金融周期可持续至15-20年，可包含多个经济周期。当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叠加时，经济扩张或收缩的幅度都会放大。金融周期下行时的经济衰退比金融周期扩张时的经济衰退幅度更大、时间更长。

中美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的错步，给中国国内货币政策、产业政策、财政政策、外汇政策、外贸政策等提出了巨大难题。如特朗普在圣诞节前刚刚签署的税改法案，将加快美国的再工业化，如果再加上美元加息、美国资产价格上涨等因素，将加剧国际资本向美国回流，加大对我国外汇储备和汇率形成的考验。

经济发展四个关键理念

第一，“三去一降一补”。为化解上述落后产能和宏观经济的高杠杆，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以“三去一降一补”为重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中制造业投资过度导致产能过剩，需要去产能；房地产投资过度，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高企，占用太多资源，需要去库存；经济整体债务过高，长期性和系统性风险突出，需要去杠杆；制度性交易成本过高，需要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平衡供需关系，提高整体资源配置效率，需要补短板。正是在这种强劲的政策作用下，PPI结束了连续54个月的同比负增长，带动2017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实现约24%的同比增长和名义GDP约12%的超预期增长。

“三去一降一补”是理解中国经济这几年变化的核心因素。结合十九大报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基调来看，“三去一降一补”仍是接下来数年的工作重点。但相比过去两年来已经实施的供给侧改革，在方向上和力度上会有所不同，未来的重点可能会侧重于“补短板”，即解决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第二，房地产不再作为支柱性产业。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提出“加快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市场”。这是对房地产业调控的重大转向，更是在于保护租赁利益相关方的合法权益。房地产泡沫是“灰犀牛”，是看得见的风险，而刺破这个泡沫则会引发房贷抵押品不足，从而招致更大的连锁式金融风险甚至金融危机。十九大报告指出，“从现在到二〇二〇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在这个前提下，防止房地产市场大起大落是很重要的调控目标。从长远来看，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逐步完成，房地产很可能不再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而成为一个保增长的防御性产业。

第三，金融开启收缩周期和强监管时期。从发生金融危机的2008年至今，我国GDP增长1.5倍到80万亿元左右的规模，而同期我国总负债却增加了3.8倍至196万亿元左右，宏观杠杆率达244%，已经超过国际警戒线。2017年7月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推动经济去杠杆，成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并且首次把去杠杆、控总量放在核心位置。这意味着去杠杆从实体经济层面转向金融，控货币必然紧信用，信用泛滥的时代已经结束，靠货币和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尾声。

伴随金融收缩的是强监管。面对金融乱象，周小川行长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部分国有企业债务风险突出，僵尸企业市场出清迟缓。一些地方政府也以各类名股实债和购买服务等方式加杠杆，一些金融机构和企业利用监管空白或缺陷打擦边球，套利行为严重。理财业务多层嵌套，资产负债期限错配，存在隐性刚性兑付，责权利扭曲等问题”。对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坚决打击违法违规金融活动，加强薄弱环节监管制度建设。不难推断，2018年防范金融风险将会有三条主线：一是国企去杠杆，二是强化地方债监管，三是严格执行资管新规。三条主线下“破刚兑、去通道、去资金池、压同业”将是必选动作。

第四，环保延续，资产估值调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打赢蓝天保卫战，调整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调整能源结构，加大节能力度和考核，调整运输结构。反映到宏观经济上，直接相关的工业原材料价格可能继续在高位盘整，上游涨价因素可能会部分传导至中下游，拉动CPI上行。CPI上行将促使国内货币政策的转向，而货币政策的转向或将引发新一轮资产估值调整。

新经济形势下的新动能

一是增长动力从投资转向消费。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2-2016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由5940美元提高到8260美元，形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消费意愿和能力较强，这将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逐步从以基建和房地产的投资转向更多地依靠消费拉动。

二是产业升级带动新经济。美国经济过去20年的发展和当前中国类似。美国在2001年出现了科技和网络股泡沫，随后美联储大幅放水，进入居民举债模式，带来了房地产泡沫，房地产泡沫接着也破灭了，现在崛起的还是以Google、Facebook等为代表的新经济。

美国的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领先于我国，但市场规律和科技革命的方向是相同的。可以断定，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下，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瞄准国际标准提高水平。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必将大力推进，从而成为继房地产以后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地址：北京宣武门西大街甲97号 邮政编码：100031 电话：编辑部63070331 发行部63070326、63070324 广告部63072603 传真：编辑部63070483、63070480 广告部63071029 零售价格：2.00元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0019号